

第2期（总第169期） 2020年5月29日

**本期导读**

|  |  |
| --- | --- |
| **研究前沿** | 全球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减贫的关系？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 |
| **专家视点** | 南半球的新冠病毒：迫切需要为低收入家庭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遏制儿童贫困的增加 |
| **减贫前线** | 应对疫情：为脆弱国家启动3000万美元的紧急应对基金 |
| **书籍推荐** | 书评：《测算世界各地的贫困》 |
|  |  |

 ·**机构专刊**·

*·研究前沿·*

**全球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减贫的关系？**

**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

Aradhna Aggarwal

**摘要**：本文使用全球147个国家1991-2015年的数据，研究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减贫之间的关系。在自由市场模式下，结构变化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反过来又会使得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复杂化。本文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去解释全球化如何影响增长和结构的动态变化。本文认为，关于增长和结构变化关系的传统观点，其核心是假设各部门内和部门间的经济活动通过前向和后向的联系而紧密关联。全球化可能会改变这种连通性，并对各个行业产生不同影响。其结果是，增加值和就业的结构性变化可能不相称，从而对部门的生产率产生不确定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假设，各因素之间的趋同对于提高生产率、促进结构性变化和发挥增长的减贫效应至关重要。使用动态面板下的广义矩估计（GMM）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这些发现对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相应的结构变化过程提出了质疑，并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战略干预，以促进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大范围经济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全球化、结构变化、减贫、跨国分析

一、**引言**

大量证据表明，全球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自1990年以来的减贫成就更为突出。而人们普遍认为，1990年是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开端。根据世界银行(2016)数据，自1990年至2013年，极端贫困人口（以2010年价格计算，每天生活费用少于1.9美元）占比从35%下降到了10.7%，绝对人数从19亿降至7.67亿。不仅如此，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世界不平等程度也从1988年的0.88下降到2013年的0.65(世界银行，2016年)。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些趋势是全球化的重要成果。与全球化相关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有助于减少全球贫困和不平等(Bourguignon，2004；Dollar和Kraay，2002；Dollar et al.，2014)。然而，许多人认为，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文献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有证据表明，各国在将增长转化为贫困和减少不平等的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Ravallion，2001； Kappel et al. 2005；相关文献综述: Škare和Družeta，2016；Melamed，2011； Bigsten和Levin，2004)。这使得经济学家们提出疑问，为什么各国的减贫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些人认为，增长的减贫效应取决于初始条件，特别是初始的不平等水平(Angelsen和Wunder ，2006；Squire，1993；Lipton和Ravallion，1995)，而其他人则关注是什么因素驱动了增长，强调教育投资的作用(Thomas et al，2000；Eicher和Garcia-Penalosa，2001)、农村多样化(Christiaensen和Kaminski, 2015)、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使用、良好的政府治理(Thomas et al, 2000)或政府的扶贫政策(Cook, 2006)。按照后一种思路，通过“结构变化”联系经济增长与减贫，成为本文的研究主题(Cook 2006；Tello，2015；Williams，1991)。本文借鉴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认为如果经济增长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那么结构变化就能确保工人获得足够的回报，使他们和家属的消费水平高于贫困线。更具体地说，本文认为与提高生产力有关的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里，结构变化指的是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部门组成的变化(Machlup，1991; Silva和Teixeira，2008)。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某种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与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参见Silva和Teixeira 2008年的文献调查)。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似乎正在挑战这种实践规律。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既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也没有带来相应的减贫成果。这一观察结果一方面促使许多人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见, Aggarwal， 2018； Fagerberg， 2000； Timmer和Szirmai， 2000; Kaniovski和Peneder ，2002；Dietrich， 2012；Vu，2017；de Vries et al.， 2012; Mcmillan et al.， 2014； Pieper，2000； Roncolato和Kucera， 2014； Üngör ，2014；Yilmaz， 2016)，另一方面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关系(见, Škare和Družeta, 2016; Bigsten和Levin, 2004 的文献综述)。然而，关于结构变化和贫困联系的文献仍然很少(Aggarwal和Kumar， 2015;Chatterjee，1995；Cook,2006;Hasan et al.，2013;Lavopa和Szirmai,2012；Kim et al.，2017；Tello，2015)。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个领域作出了贡献。

**首先**，本文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解释了全球化如何使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变得具有异质性和复杂性，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反过来影响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现有文献将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与结构变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的现象，归因于一个国家的内部条件，比如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政策制定者决定的货币价值和劳动力的市场粘性(Macmillan et al .， 2014)。然而，迄今为止,全球化如何阻碍这种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之间潜在的联通，并破坏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减贫之间相互加强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其次**，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衡量生产力提高导致的结构变化。过去文献中广泛使用的两个最常见的结构变化指标是部门增加值份额的变化(例如，Clark， 1940； Fischer， 1939；Cook，2006； Szirmai 和Verspagen， 2015)和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化(例如，Chenery et al., 1986;Timmer和de Vries，2009)。继Dietrich(2012)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文献，使用部门GDP份额或就业份额数据测算结构性变化幅度。把部门增加值和就业份额作为结构改革的替代指标，基于这样的前提：两个因素往往在增长过程中收敛，正如历史上发达国家那样。 但是，考虑到当前新兴国家各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两者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任何测算结构变化的指标都应以这一现实情况为基础。此外，没有一个常用的指标表明结构性变化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这对本文的分析至关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结构变化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文献中提出了一些促进增长的结构变化指标。例如，Macmillan et al.(2014)在转移份额分解中重点关注了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对增加值的贡献。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方法可能低估了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变化，因为在转移份额分解中，部分劳动力的部门间转移可能被计入“内部”效应(Timmer和de Vries, 2009)。为了解决这个问题,Vu(2017)提出了有效结构变化指数，这是对Dietrich (2012)指数的修正,仅考虑那些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作出积极贡献部门的就业份额变化，而不考虑就业份额的整体变化方向。这种方法并非完全不受Dietrich指数固有的限制。这里提出的新方法侧重于增加值的部门份额和就业之间的差距，以此衡量促进增长的结构性变化，本文称之为“收敛结构性变化”。分析中，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概念将被混同使用。**第三**，本文可说是第一次尝试使用定量工具来评估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结构变化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对象包括了126个发展中国家，遍布十个主要区域。数据来源于1991至2015年的国际数据库。使用由Arellano和Bond(1991)建立的广义矩估计方法得到的定量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关键假设。我们利用这些分析提出了有关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增长的一些相关问题，并在结论中强调，除市场友好型改革(McMillan etal.,2014年)或再分配政策(世界银行，2016)外，还需要政府更深层次的战略性干预，以促进持续的、广泛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第二节讨论增长-结构变化和贫困联系的理论基础。第三和第四节利用联合国统计司的国民核算数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劳工统计数据和世界发展指标（WDI）的国内总产值数据，记录了20年来世界所有主要发展中区域的增长和结构转变过程。第五节根据世界银行在其贫困与公平数据门户上提供的数据，专门分析贫困和不平等的趋势。第六节汇总了不同部门分析的数据，并使用定量技术调查了促进增长的结构性变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七节给出了政策建议。

**二、以历史和现代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减贫的关系**

从历史角度看，现代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伴随着生产和资源的结构性转移，首先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然后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 (Kuznets,1966;Gabardo et al. ,2017)。历史时间序列数据有力地证实了当今发达经济体的这种结构转型过程。这种从历史上观察到的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由三种相互支持的机制支撑的:劳动力拉动(Lewis1954)，劳动力推动(Nurkse，1953； Rostow， 1960)，以及就业与增加值的结构动态调整(Alvarez， et al 2011)。这是基于以下假设:一方面，行业之间的需求收入弹性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模式也存在行业差异。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从低收入弹性的农产品转向有着高收入弹性的工业部门产品，从而触发了工业的“劳动力拉动”机制。另一方面，作用于农业的“劳动力推动”效应，则通常与农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相关(Ngai和Pissarides, 2007；Timmer, 2007)。然而，工业部门由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包括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享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因此，尽管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往往较少，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所占份额可能仍然很大。因此，部门的就业和增加值份额往往会出现分歧，具体而言，在农业部门中工作的人口相对较多，却只产生比例较小的增加值，进一步恶化了贫困情况。

这就需要在部门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之间进行动态调整，这种动态来自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迅速扩张。它不仅能够拉动劳动力，还能够通过提高农业投入和该部门的技术质量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产生“推动劳动力”的效应。而“劳动力拉动”效应减轻了农业部门的压力。因此，农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缩小，它们的增加值和就业份额就会倾向于趋同。两个部门之间的初始生产力差距越小，融合的速度就越快(Timmer，2007)。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水平的工业活力刺激了服务业的增长和扩张。这导致资源重新分配给服务业，并引发了增加值和就业份额之间的动态收敛过程。但是，增加价值和就业的部门份额并不完全趋同。受规模报酬递增影响的制造业(Kaldor-Verdoorn法则)，会持续从低技能密集度的工作向中技能密集度和高技能密集度的工作升级，进一步推动其他部门的追赶动力，从而提高部门整体的生产力并促进经济增长。在国家支持下，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动态扩张普遍削弱了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障碍。因此，结构变化过程是一个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因果关系累积”强化和加速增长的过程（Chenery et al. 1986;Kaldor 1966; Storm 2015)。在这一进程中，各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趋于收敛，平均收入持续增长，从而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减少。

传统增长-结构变化关系的机制需要两个基本条件才能运作。**第一**，各部门内和部门间的需求动态和经济活动通过向前和向后的联系彼此密切相连(并相互依赖)(Pasinetti, 1981年；Verspagen ，1993)。**第二**，快速增长的行业与迎头赶上的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一开始并不大。然而通过贸易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将一国的经济与全球市场结合起来的全球化可能会破坏新兴经济体的这两个基本条件。

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这些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大大高于其他部门，影响了其他部门迎头赶上的进程，因此相当不利于结构调整的速度。不仅如此，与其它行业相比，全球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在生产率增长上要快得多，这可能导致行业增加值与就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不是趋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非常大，因为行业内和行业间的连通性(第一个基本条件)也受到全球化的非对称影响。完全贸易的部门的增长实际上可能会造成类似“资源诅咒”的局面，并对“非完全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造成不对称的影响。它可能通过价格和需求机制，以牺牲前者为代价，促进后者的增长。

当贸易部门的生产力快速增长,竞争和资本流动加剧为经济体内部的非贸易部门创造了需求时，需求机制才起作用。而对于非完全贸易部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需求的任何增长，都可能直接指向国际市场（Krüger，2008；Timmer，2007)。需求上升对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造成压力，刺激了对非贸易部门的投资。相比之下，非完全贸易部门在国内扩张的需求溢出效应很少。由于完全贸易部门本身依赖于全球需求，它们自身的增长潜力可能受到严重限制。即使制造业出现经济专业化的趋势，但由于部门内和部门间联系薄弱，增长可能仍然集中于特定的产业，而对其他产业和部门影响不大，从而阻碍了使制造业成为增长核心的“Kaldor-Verdoorn动力效应”(Kaldor，1966)。

非贸易部门扩张并引致了劳动力拉动效应。这些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Alvarez-Cuadrado等人，2017年)。这些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低替代弹性又促进了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原因，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贸易部门会产生劳动力推动效应。

在全球化体制下，结构性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这反过来又会使结构性变化的减贫效果变得更加复杂。本文要验证的主要假设为：

H0：只有伴随着促进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即通过缩小各部门增加值和就业份额差距，经济增长才能减少贫困。

为了验证这个主要假设，我检验了一系列的子假设去理解这些复杂性导致的最终结果。

* H1：全球化与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有关。
* H2：2000年后期的加速增长与部门份额增加带来的结构变化加速有关。
* H3：2000年后新兴经济体部门增加值份额的结构变化不符合当今发达国家历史上所观察到的模式，而且也没有遵循任何结构变化的系统性模式。
* H4：全球化很可能促进了经济的专业分工，以牺牲贸易部门为代价，支持不可贸易部门的扩张。
* H5：新兴经济体中，增加值和就业的结构变化可能并不相称，对跨部门的生产率差异产生了不确定的影响。

接下来,我将通过分析10个主要地区新兴经济体的行业增加值和就业份额变化造成的结构变化模式检验这些子假设。这10个地区分别为：加勒比和中美洲(CCA)、南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SSA)、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南亚、东南亚、东亚、中亚、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CEE)。

**三、全球化和经济增长**

**H1:全球化与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有关**。

全球化与通过贸易实现的国际市场一体化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有关，从主流的新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正在促进增长。主流理论(Solow, 1958)在决定增长的因素中更为关注资源的可得性和效率，强调全球一体化如何通过向一国已显示出比较优势的高生产率部门重新分配资源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新增长理论(Romer, 1994)认为，知识流动是全球一体化影响国家增长的关键渠道。全球化促进了知识创造、技术变革和创新。然而，新制度经济学(Acemoglu et al.， 2005；North, 1990)认为全球一体化对资源配置和知识传播效率的影响取决于特定的制度和政治环境下所产生的激励和约束。同样，地理视角也被学者重新提起(Diamond, 1997;Sachs，2001, 2012)，他们在解释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考虑了地理位置、气候和自然资源禀赋。例如，由于无法进入海港或与主要贸易中心相距遥远，国际贸易可能会被严重限制，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现有的研究全球化对增长影响的文献仍然没有定论(文献综述请见Samimi和Jenatabadi，2014)。

使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本文评估了196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该数据库提供了四个系列指标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转换为基期美元的GDP增长，转换为基期美元的人均GDP增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增长以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增长。虽然GDP增长是衡量经济表现的主要指标，但是人均GDP增长反映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我们对减贫的分析来看，后者更有现实意义。然而，以基期美元衡量增长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汇率是一个政策问题，不能反映购买力的差异(Bhalla， 2002)。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是最受欢迎的增长指标。

粗略的分析表明,世界GDP(以2010美元的价格)在1960年11.2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增加了66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77.3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5%。GDP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2016年的人均GDP(以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比1960年增长了300%，年均增长率为2.0%。

然而，对增长趋势的年度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增长态势极不平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GDP增长达到了6%以上，类似的情况之后再未出现。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每一次经济增长的峰值都比之前的峰值要小，至少在2000年以前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市场化和外部主导的改革，标志着经济理论与实践朝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转变。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在90年代变得更加普遍，被称为“全球化”进程。然而，就GDP和按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而言，世界并没有从这一转变中得到实质性的好处。本世纪头十年，随着全球化力量的释放，全球经济实现了迅猛增长。2000年后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明显上升。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数据中。初步证据表明，2000年以后的政策调整有助于世界人口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

为了区分不同国家的增长模式，全球经济体可以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标准分类方法分为四种收入类别的国家: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本文研究表明，2000年以后全球经济增长加速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增长所驱动的。上世纪9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一直引领着世界经济增长，2000年后，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大幅放缓，中高、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超过了这些国家。

对增长模式的进一步分析表明，2000年后全球增长加速是空前普遍的。2000年后，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经济增长，各国之间的增长率差距(增长率的变化系数)都有了明显缩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模式，本文还研究了世界银行自1987年以来205个国家收入类别的历史分类数据(Fantom和Serajuddin, 2016)。结果显示，在1990年至2016年期间，有112个(发展中)国家至少跨过了一个收入门槛。在其余的93个国家中，有43个国家在1990年已经属于高收入国家，其余50个国家类型不变。然而，分析显示，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后达到这一成就的。上世纪90年代，只有28个国家提高了一个收入门槛水平，而另外25个国家则降低了一个收入门槛水平。相比之下，2000年后世界银行提高了130个国家的收入类别。在这些国家中，有22个国家刚刚恢复了它们在上世纪90年代失去的地位，而有108个国家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

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增长模式的分析表明，几乎所有区域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加速。为分析便利,世界经济体被分为13个区域:加勒比和中美洲(CCA)、南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SSA)、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南亚、东南亚、东亚、中亚、欧洲中部和东部、北美(NA)、欧洲其他国家、澳洲。2000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中亚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恢复所推动的。需要指出的是，中亚地区包括前苏联控制下的亚洲国家，而中东欧国家是前苏联控制下的欧洲国家。这些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其中几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失去了经济排名。尽管如此，2000年之后，一些国家所经历的增长不仅仅是复苏，还越过了之前的收入类别，如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阿塞拜疆、克罗地亚和捷克共和国。2000年后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另一个主要贡献者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些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率为负，2000年以后，增长率提高到了2%以上。不过尽管如此，1990年至2016年未跨越任何阈值水平的50个国家中，有27个国家位于该区域，分布在西非、中非和东非地区。此外，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是上世纪90年代表现最好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的增长表现进一步增强。在过去20年里，中国引领了东亚的增长进程，跨越了两个收入门槛。在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柬埔寨都跨过了一个门槛。在南亚，虽然印度主导了增长进程，但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不丹也经历了经济加速增长的阶段。加勒比和中美洲和太平洋岛屿是唯一平均年增长率略微下降的区域。除南亚(由于印度的飞速增长)、加勒比和中美洲区域外，所有发展中区域内部的增长率差异在本世纪头十年都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是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带来了更完全的区域一体化。

尽管如上文所述，区域内部的增长率存在趋同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增长率的趋同并没有转化为收入水平的趋同。这意味着发展中地区的增长速度不够快，无法赶上发达地区。事实上，除东亚以外，没有任何地区人均GDP的平均差距缩小；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国家经历了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现在这些国家正努力缩小这一差距。中东和北非地区、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进程似乎已停滞不前。其他区域的国家已经完全落后(加勒比和中美洲、南亚、撒哈拉以南、太平洋岛屿、南美)。2008年的全球危机起到了缓和作用，但最近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再次开始扩大。

综上所述，全球化进程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改革，但它并没有在增长方面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2000年后出现了转机，大多数新兴国家的经济表现得到提升，这映证了本文的假设。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本文将探讨这种增长趋势是如何与GDP、就业以及贫困的结构性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增长和增加值的结构变化**

**H2 ：2000年后的增长加速与部门增加值结构变化加速有关。**

使用结构变化的绝对值范数（Dietrich2012）[[1]](#footnote-1)解决第一个问题：

NAVs,t= 0.5\*Σ|Xit-Xis|,

Xit-Xis代表t年和s年部门占GDP的份额的差异。

NAV指数计算的平均间隔是15年:分别使用10个发展中地区的7个部门1985年至2000年和2000年至2015年的增加值。涉及的部门为初级部门；制造；采矿和公用事业；建筑业；贸易、旅馆和修理；交通和通信；其他服务业。该分析是基于1970年至2015年联合国统计司的国民核算数据(以基期美元计算)。经过计算后我们发现，21世纪头十年的增长转变加速了所有地区的结构转型进程。但东亚和东南亚例外，该地区在1985-1990年期间经历了巨大的结构变化，但自那以后增长就放缓了。

尽管结构变化的速度普遍增加，但存在着广泛的区域差异。按人均GDP计算，排在最后三位的区域，即非洲撒哈拉以南、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其部门在国内GDP中所占比例的结构变化最为显著。前两者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加快，但后者就没那么成功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除采矿以外的经济活动重要性日益提升。拉丁美洲相对高收入的地区结构变化最慢。这些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也落后于其他地区。就工业占GDP的比例而言，中亚和中东欧的前苏联国家1990年以前就实现了高水平的工业化，这源于苏联体制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计划，这些国家近年来似乎经历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并与东亚和东南亚一样，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球中等位置。

**H3: 2000年以后新兴经济体部门****增加值份额的结构变化不符合发达国家历史上所观察到的模式，也不遵循任何系统的结构变化模式。**

为了检验这一假说，以1971年到2015年各地区的长期部门增加值份额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分为四大部门:农业和相关活动、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以及服务业(包括建筑业)。结果表明，结构变化模式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差异，这与假设H1一致。例如，农业比重在所有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个例外，农业比重在该地区从1985年的12%增长到2015年的16%。制造业在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和北非及中东欧的份额有所上升，但在其它地区的份额有所下降。最后，服务业比重上升似乎是所有地区的共同特征，但东亚和中东欧国家却是例外。2000年后的虚拟变量(如果年份是1999年以后，则D2000=1)系数、1991-2015年期间GDP的部门份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也支持了以上的论述。

**H4:全球化会促进经济专业化，以牺牲贸易部门为代价推动非贸易部门的扩张。**

第三个突出的问题是结构变化过程中可贸易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增值份额。部门可分为两类。农业、采矿和制造业可被视为典型的可贸易部门；建筑业基本上是一个非贸易部门。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业正日益成为可以贸易的行业。然而，来自美国的证据表明，平均来说，服务部门的可贸易性低于制造业部门，而且该部门内部可贸易性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Gervais和Jensen 2012;Ariu 2012)。因此，服务业是一个异质性的部门，同时包括可贸易和不可贸易的成分。我们注意到，新兴经济体中有一种趋势，即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并专门从事三个典型的可贸易行业之一:农业、矿业或制造业。尽管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有所扩大，但南美、非洲撒哈拉以南和中亚往往专注于资源密集型行业，如采矿业。在人均GDP增长方面垫底的中美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小岛屿，似乎所有典型的可贸易部门在GDP中都失去了份额。

从理论上讲，快速增长的专业化部门应该创造收入，并通过行业内和行业间的联系，加强自身的增长，同时提升其他(非专业化)贸易部门的业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所有这些地区中，可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伴随着非完全贸易部门份额的下降。专业化贸易部门本身的增长是递增的，除东亚之外的地区，制造业的份额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建筑业和（或）服务业的份额在所有区域都有扩大的趋势。服务确实有可能进行贸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排除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有迹象表明,完全贸易部门的扩张伴随着非贸易部门的扩张(H2)。然而，在从这一分析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四、在比较的框架下审视附加值和就业的结构构成**

**H5：在新兴经济体中，增加值和就业的结构性变化可能并不相称，它们对跨部门生产率分散程度的影响并不明确。**

为找到新兴国家增加值份额结构变化模式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的原因，本节将探讨增加值份额变化是否和就业份额的变化有关。还将对关于H2的判断提供进一步的见解。使用上述五个经济部门分类，研究1990年以后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就业和增值份额之间的部门差距。

针对北美和西欧两个发达地区的研究表明，现代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中，增加值和就业份额呈现趋同态势。1991年，这两个地区的增加值和就业份额的差距在正负5%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份额差距进一步缩小。可以看出，在全球化初期，制造业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份额，而服务业吸收劳动则相对较小，生产率更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将劳动力重新配置到服务业，使服务业和制造业实现融合。农业和矿业也继续处于追赶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发展中地区，跨部门的增加值和就业份额也有趋同的趋势。

但是，增加值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趋同模式之间存在着区域差异。在增加值份额结构变化最显著的地区，即南亚、中东和北非、中亚，各部门就业占总就业的份额没有出现相应的变化，结果呈现出不合理的趋同。这些地区，经济增长和部门份额之间也没有显现出系统性的关系。相比之下，东亚、中东欧和东南亚地区则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动态趋同过程，并且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南美和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在经济增长和增加值份额结构变化方面一直落后，它们在趋同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活力。“太平洋诸岛”在增加值结构变化方面似乎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且呈现出急剧趋同的过程。然而，这并没有反映在它们的经济表现中。

事实上，发展中地区增长-结构变化关系的驱动机制与发达地区制造业驱动的累积因果过程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劳动力从典型的可贸易部门重新分配到建筑业和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的结果。国内增长没有溢出效应的情况下，全球竞争的压力推动而非拉动劳动力，因此，劳动力被吸引到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较低的不可贸易部门。为了探讨最终结果如何取决于完全贸易部门、非完全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以及这些部门最初的生产率，我把这些地区分成了三组:

* **资源密集型部门专业化的地区**:可以看出，撒哈拉以南地区农业和中亚采矿业的扩张并没有引发其他行业的劳动力流动，导致了小规模的趋同效应。在南美洲，劳动力明显地从农业(由于专业化)重新分配到服务业，而其它行业没有发生动态变化。然而，农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初始生产率差距很小，这减少了结构性变化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影响了增长。
* **制造业和服务业专业化的地区**:东亚和中东欧似乎成功地遵循了传统的增长和结构变革模式。但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尽管扩大了制造业份额，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不那么成功，这反映在制造业增长相当缓慢上。南亚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的动力，与其说是制造业，不如说是可贸易服务。由于发达的IT产业，这里也成为服务业的结构性变化正在提高生产率的唯一地区。因此，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削减劳动力。由于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已经被困在农业中，劳动力正转入建筑业，而这个行业几乎没有活力。
* **没有明显专业化趋势的地区**:太平洋岛屿似乎陷入了低生产率陷阱，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低生产率的服务业，甚至采矿业，其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潜力很低。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在增长或结构变化方面没有表现出多少活力。

部门间生产力水平变化系数的结果表明，同H3一样，全球化造成了增加值和就业份额变化的不平衡格局，这种格局对部门生产力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使结构变化、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复杂化，需要定量工具来评估这些关系。

**五、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

**贫困的趋势**

本节对过去几年来贫困和不平等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依托世界银行在其贫困与平等数据门户网站上最近发布的贫困数据。该门户网站提供了三种测算贫困的指标：贫困人口比率、贫困差距和贫困差距的平方，均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贫困人口比率是衡量贫困发生率的一个指标，显示了收入低于预先设定的贫困线的人口百分比。另一方面，贫困差距和贫困差距的平方分别测算了贫困的深度和严重程度。前者测算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穷人与贫困线的距离，而后者更看重那些收入远远低于贫困线的人，而不是那些接近贫困线的人。世界银行(2016)的数据显示，日消费低于1.9美元的极端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的35%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10.7%，使11.3亿人日消费不足1.9美元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不仅如此，生活在离贫困线较远的贫困人口也从8.08亿下降到2.34亿(下降了5.74亿人)，因此贫困差距平方的大小在逐渐接近贫困差距。

1980年，极端贫困水平的区域差异非常大，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2-3%，而东亚地区高达75%。在贫困率高于40%的地区(东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和低于20%的低贫困地区(中东欧、中亚、南美、中东和北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将东亚和东南亚划分为第一组**，这些地区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在本世纪头十年逐渐与低贫困地区趋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贫困程度和严重程度也随之迅速下降。南亚的发展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减贫进程相对缓慢，该区域在减少贫困的深度和严重程度方面比降低贫困发生率更为成功。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岛国尽管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化，但在减贫方面仍然落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该地区经历了极端贫困的增加，21世纪头十年有所改善，但仍有40%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经常与东亚联系在一起的太平洋岛国似乎在减贫成就上远不如东亚。尽管生产率高速追赶，但是贫困人口占比仍高达40%。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贫困差距有所缩小，但仍保持在10%或以上。这些地区的贫困程度也最为突出，而其他地区则趋于相同。在第二组，前苏联国家，特别是中亚国家，随着苏联的解体，在20世纪90年代贫困急剧增加。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复苏。中东欧国家不仅实现了经济复苏，贫困人口比例也从1990年的水平有所下降，而中亚地区恢复到原有水平仍需时间。拉丁美洲也在缓慢地降低贫困率。1981年，拉丁美洲的贫困差距比亚洲地区的差距要小得多，但2013年，拉丁美洲仅能将其与亚洲的差距从5%缩小到2.5%左右。这些全球的贫困特征明确暗示了促进增长的结构转型和减贫之间的联系。

**不平等的趋势**

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方法，范围从0(最平等)到1(最不平等)，地区基尼系数有3年是缺失的:1987年、1999年和2013年（Heshmanti 2004）。本文发现，1991年，中东欧国家基尼系数为0.3，南美的基尼系数则超过了0.5。南美洲和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的不平等程度最高。21世纪头10年，这些地区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增长-结构变化的动力较弱。同时，这些地区仍然是最不平等的地区。其他有着促进生产的结构变化的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太平洋岛屿地区是第三和第四不平等的地区。遵循传统增长模式的东亚和中东欧国家则处于不平等的另一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却无法降低不平等程度。南亚、中亚、东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中亚以采矿业为主，贫困程度的下降并不明显，但该地区的不平等程度似乎发生了显著下降。总体而言，与贫困不同，不平等模式似乎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六、减贫、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相互关系：一个定量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发展中地区在增长、结构转型和减贫动力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在本节中，我将分析这三个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用国家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将用于分析增长、结构变化和减贫的不同数据库合并成一个单一的面板数据，得到1991年至2013年11年间所有区域的147个国家的数据。在147个国家中，126个是发展中国家。早期的样本数据之间相隔两年，2010年之后的数据是连续的。分析的重点是126个发展中国家2002-2013年共7年的情况。为了估计增长、结构变化和贫困之间的联系，重点关注促进增长的结构变化对贫穷的影响:

贫困/不平等=f(收入水平，经济结构，政府分配政策)

由于是面板数据，控制了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改变的国家特定因素(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可用性、历史等)和年份特定因素(经济、政治或国际因素)的影响。因此，确定了以下估计:

Yit=α0+λXit+λSit+λTPit+Tr+Tt+Ci+εit (方程1)

* Yit 表示某一特定国家在t时刻的贫困和不平等比率。贫困的测算指标是贫困人口占比、贫困差距和贫困差距平方。对于不平等，我使用两种度量方法:一是基尼系数，二是收入分布的30%分位数与70%分位数之间的比例。
* Xit是人均GDP的对数值，预期和贫困以及不平等是负相关的。
* S是一个代表促进增长的结构变化的指数。由于结构指标变量是本研究的创新之一，所以有必要向读者解释其含义。该指数是部门增加值和就业份额之差的绝对值，根据部门求和后再取相反数得到的结果。即：

S=-Σ|(Yit-Xit)|

Yit 是i行业在t年的就业份额，Xit是相应的增值份额。S被认为与贫困和不平等负相关。指数越高，增加值与就业份额的差距就越小，因此贫困与不平等的比例就越小，可称为“趋同结构变化”。除了这个变量，还使用了就业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作为结构变量，这两者都被假定与贫困和不平等是负相关的。

* TP代表转移支付，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代理变量，用转移支付占GDP的份额衡量。本文同样预期该指标会负向影响收入和不平等。
* Tr是一个趋势变量。
* Ci代表了随时间不变的国家效应，Tt捕捉了所有国家均相同的时间效应。

方程1中使用的变量存在内生性，这是由于贫困和不平等与人均GDP之间的同时性造成的。例如，当解释人均GDP增长对贫困(Lopez和Serven, 2006)和不平等(Kuznets, 1955)的影响时，也有许多其他人关注贫困和不平等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Persson和Tabellini, 1994；Alesina和Rodrik, 1994;Castello-Climent, 2010;Naguib, 2017)。为解决这个问题，我采用了由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广义矩估计（GMM）方法。GMM估计量计算了每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消除了国家固定效应，并使用因变量更高阶的滞后项作为因变量一阶差分的滞后项的工具变量。因此，方程1可以写成

ΔYit = α0+λΔXit + λΔSit + λΔTPit + Tt +Tr + εit (方程2)

**绝对贫困**

对于贫困分析，首先基于面板数据对一阶差分变量进行2SLS估计，基准年的人均收入被用作经济增长的工具变量。接下来，我使用方程2的Arelano-Bond (AB)动态面板估计。值得指出的是，我使用其他度量贫困和结构变化的指标，以及2SLS和AB两种估计方法来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1和表2展示了有关绝对贫困的估计结果。

**表 1: 绝对贫困增长和结构变化， 2SLS面板数据估计**

|  |  |  |  |
| --- | --- | --- | --- |
|  | 贫困发生率变化 | 贫困差距的变化 | 贫困差距平方的变化 |
|  | (1) | (2) | (3) | (4) | (5) | (6) |
| 收敛的结构变化 | -3.00E-04 |  | -2.40E-04\* |  | -1.90E-04\* |  |
|  | (-1.18) |  | (-1.66) |  | (-1.89) |  |
| 人均GDP增长 | -0.241\*\*\* | -0.233\*\*\* | -0.109\*\*\* | -0.103\*\*\* | -0.0565\*\*\* | -0.0526\*\*\* |
|  | (-7.97) | (-7.61) | (-6.44) | (-6.03) | (-4.64) | (-4.25) |
| 转移支付份额的变化 | 1.07E-04 | 1.10E-04 | 1.09E-04 | 1.24E-04 | 9.09E-05 | 1.07E-04 |
|  | (0.42) | (0.43) | (0.77) | (0.87) | (0.89) | (1.04) |
| 制造业就业份额变化 |  | -0.000798 |  | -0.000101 |  | 0.000105 |
|  |  | (-0.65) |  | (-0.15) |  | (0.21) |
| 服务业就业份额变化 |  | -0.0011 |  | -0.0007\*\* |  | -0.0005\* |
|  |  | (-1.78) |  | (-2.06) |  | (-1.97) |
| 趋势项 | -.0000446 | -.000101 | .0003667 | .0003393 | .0004627\*\* | 0004506\*\* |
|  | (-.09) | (-.84) | (1.34) | (1.25) | (2.35) | (2.29) |
| 常数项 | -0.000347 | 0.000358 | -0.00326 | -0.00286 | -.0186325 | -.0180313 |
|  | (-0.08) | (0.08) | (-1.32) | (-1.17) | (-2.48) | (-2.41) |
| 观测值 | 664 | 664 | 664 | 664 | 664 | 664 |
| 时间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来源：作者估计结果

 对于所有的贫困指标，表1的2SLS结果均证实了收敛的(促进增长的)结构变化与减贫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有趣的是，随着贫困的加剧，结构性变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显著。与贫困发生率相比，促进增长的结构变化更有效地改善了贫困的深度和严重性。这可能是因为结构变化将困在生产率极低的工作(农业)中的劳动力重新分配到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工作(服务业和建筑业)中，尽管高生产率部门可能正在将劳动力挤出市场。本文还采用了其他指标衡量结构变化，即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变化，结果表明，服务业的扩大具有减贫的作用，而制造业份额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如上所述，生产力趋同主要是由劳动力从农业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服务业和建筑业的重新分配所推动的。制造业与这一过程的关系不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那么重要了(Szirmai和Verspagen, 2015;Szirmai et al. 2013, Szirmai 2012)。这说明制造业的局部溢出效应受到了抑制，原因在于影响其增长动力的部门内和部门间联系薄弱。但不容忽视的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东亚、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的贫困人口下降速度最快。制造业份额迅速增长的中东和北非地区似乎也在减贫方面成效斐然。南亚是个例外，尽管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结构变化以及减贫并没有显示出多大活力。显然，在全球化的体制下，仅增加制造业份额是不足以减少贫困的。另一方面，服务业的扩张成为减贫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带来趋同的结构变化的调节机制。但劳动力重新分配到服务业可能会拉低服务业的生产率，使其与农业生产率趋同。

在控制了促进增长的结构变化的影响之后，人均收入的增长仍对所有贫困测算指标产生负面影响。在所有情形中，这一效应在统计上均达到1%的显著水平。结果正如预期。增长确实是减贫的关键驱动力(参见Fosu, 2017)。但是，应该注意到，贫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贫困强度的提升在不断变弱。显然，具有合意的结构变化增长对于改善贫困的深度和广度至关重要。此外，与预期相反，政府转移支付似乎没有起到显著的减贫效果。在所有的模型中，转移支付的系数都不显著。最后，在贫困程度模型中，趋势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如果没有增长和结构变化，贫困程度就会增加。

本文也计算了Arelro-Bond GMM估计量，表2是带有三年滞后项的一阶差分GMM估计结果。所有的GMM回归都使用稳健的标准误。萨根检验拒绝了方程被过度识别的原假设。可以看出，AB结果证实了2SLS的结果，尽管显著性水平较低。因此，上述关键变量的结果在统计方法上是稳健的。

**表2：绝对贫困增长和结构变化，Arellano-Bond估计**

|  |  |  |  |
| --- | --- | --- | --- |
|  | 贫困发生率变化 | 贫困差距的变化 | 贫困差距平方的变化 |
|  | (1) | (2) | (3) | (4) | (5) | (6) |
| 人均GDP增长 | -0.129\*\*\* | -0.122\*\*\* | -0.0611\*\* | -0.0573\*\* | -0.0305 | -0.0281 |
|  | (-4.16) | (-3.90) | (-2.85) | (-2.58) | (-1.77) | (-1.61) |
| 收敛的结构变化 | -0.00021\* |  | -0.00040\* |  | -0.00034\* |  |
|  | (0.51) |  | (1.79) |  | (1.67) |  |
| 转移支付份额的变化 | 0.000178 | 0.000128 | 0.0000330 | 0.0000451 | -0.0000354 | -0.0000209 |
|  | (0.71) | (0.48) | (0.15) | (0.20) | (-0.18) | (-0.11) |
| 趋势项 | 0.00616\*\*\* | 0.00693\*\*\* | 0.00345\* | 0.00364\*\* | 0.00190\* | 0.00192\* |
|  | (3.54) | (3.53) | (2.53) | (2.66) | (1.73) | (1.69) |
| 制造业的就业份额 |  | 0.000448 |  | 0.000247 |  | -0.0000508 |
|  |  | (0.41) |  | (0.31) |  | (-0.08) |
| 服务业的就业份额 |  | -0.00123 |  | -0.000826\* |  | -0.000583 |
|  |  | (-1.41) |  | (-1.85) |  | (-1.52) |
| 常数项 | -10.85\*\*\* | -12.36\*\*\* | -6.199\* | -6.545\*\*\* | -3.438\* | -3.456\* |
|  | (-3.41) | (-3.39) | (-2.48) | (-2.62) | (-1.72) | (-1.66) |
| 观测值 | 661 | 661 | 661 | 661 | 661 | 661 |
| SAGRAN检验 | 92.5\*\* | 93.3\*\*\* | 117.2\* | 119.7\*\*\* | 175.6\*\*\* | 180.9\*\*\* |

来源：作者估计结果

**不平等**

自库兹涅茨(1955)之后，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激烈争论的主题(Binatli 2012, Naguib, 2017;Molero-Simarro, 2017，世界银行，2016年最新调查)。现有的研究结果模棱两可。我们在这里同时使用2SLS和Arelano-Bond GMM估计方程(1)，并采用两种衡量不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和70-30分位数之比。前者代表不平等的平均发生率，而后者则是衡量了“不平等严重程度”。有关不平等指标存在数据缺失的问题，根据现有数据进行了估算。此外，由于因变量变化微小，一阶差分(方程2)水平难以使用2SLS估计。因此，在控制了滞后变量、时间和趋势的影响之后，对方程1进行了水平估计。

表3是估计结果：基尼系数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相当模糊。但是，在十分位数比(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AB估计中，这种正向关系更显著，这表明人均GDP的增长可能会加剧顶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然而，上述结果并不可靠。因为在AB估计中，结构变化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不平等发生率有负面影响，而对其严重程度却没有明显的影响。可以看出，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份额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服务业就业份额前的系数是显著的，制造业份额的并不显著。然而，十分位数比率并没有受到部门份额的显著影响。转移支付变量在所有列中都是显著的，并带有一个负号，这证实了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等分配政策进行干预，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假设。例如，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研究，巴西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CCT)对降低不平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本世纪头十年不平等下降了的10%-15%要归功于该项计划。最后，与贫困相比，不平等在控制了增长、结构变化和分配的影响之后，呈现出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趋势，不过该结果只有在AB估计中才显著。

**表3:不平等，结构变化和增长,2 SLS 和Arellano Bond 估计**

|  |  |  |
| --- | --- | --- |
|  | 基尼系数 | 70-30分位数之比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2SLS | AB | 2SLS | AB |
| 人均GDP | -0.00781 | -0.00765 | -0.00194 | 0.0316 | 0.126 | 0.140 | 0.678\* | 0.516 |
|  | (-1.07) | (-1.03) | (-0.11) | (1.47) | (0.73) | (0.80) | (1.84) | (1.50) |
| 结构化指数 | -0.00015\* |  | -0.00055\*\* |  | -0.00113 |  | -0.000628 |  |
|  | (-1.83) |  | (-3.25) |  | (-0.61) |  | (0.18) |  |
| 转移支付占GDP的比重 | -0.000144\* | -0.000136\* | - 0.000155\* | - 0.000219\* | -0.00107 | -0.00110 | -0.00338\* | -0.00390\* |
|  | (-1.72) | (-1.62) | (-1.63) | (-1.95) | (-0.55) | (-0.56) | (-1.76) | (-2.05) |
| 趋势项 | -0.000205 | -0.000255 | -0.000305 | -0.00225 | -0.00885 | -0.00752 | -0.0491\* | -0.0470\* |
|  | (-0.70) | (-0.85) | (-0.30) | (-1.66) | (-1.25) | (-1.05) | (-2.11) | (-2.12) |
| 制造业就业份额 |  | -0.000351 |  | -0.00111 |  | 0.00406 |  | 0.00694 |
|  |  | (-0.90) |  | (-1.08) |  | (0.46) |  | (0.56) |
| 服务业就业份额 |  | -0.000141 |  | -0.00154\* |  | -0.00384 |  | 0.00732 |
|  |  | (-0.78) |  | (-2.29) |  | (-0.93) |  | (0.88) |
| 常数项 | 0.266\*\*\* | 0.283\*\*\* | 0.793 | 4.524 | -0.275 | -0.259 | 90.08\* | 87.08\* |
|  | (4.39) | (4.68) | (0.43) | (1.81) | (-0.20) | (-0.19) | (2.13) | (2.14) |
| 观测值 | 648 | 648 | 642 | 642 | 588 | 588 | 581 | 581 |
| 国家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时间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来源：作者估计结果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与增长相关的促进生产率收敛的结构变化对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各方面均产生了正向影响。然而，挑战在于如何触发并维持这一过程。发展中国家这一进程的机制基础与目前发达国家的大不相同。

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总量份额的迅速增加和农业份额的下降在推动经济增长走向更快的发展路径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率依赖于在高回报和高需求收入弹性部门的专业化。以制造业为核心的持续升级和技术变革，推动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循环、累积和因势利导的增长过程，进而推动了以行业需求外溢为特征的经济体系的技术依存和互补。

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基本上是可贸易和不可贸易部门的相对部门增加值和就业份额不对称变化的结果。最具活力的高生产率贸易部门本身的增长是由全球需求刺激推动的，部门间和部门内扭曲的关系促进了非贸易部门的增长。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薄弱且不可持续。一种可能性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不会出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这取决于贸易专业部门和各部门的初始生产力水平，正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拉丁美洲甚至南亚出现的情况。这样即使出现趋同的结构性变化，也可能不会长期持续下去。

人们注意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构性变化会降低服务业的生产率，造成与农业的趋同。因此，经济系统内没有内生驱动部门间生产力增长的动力，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

毫无疑问，全球一体化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利用这些机会需要国家层面强有力的相应政策。宽基础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支持该战略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正确的战略，以确保快速增长行业的广泛溢出效应，要能成功预见实施这一战略的挑战，并设计适当的执行措施，先发制人。

此外，如上所述，制造业是联系增长、结构变化和贫困的关键。制造业战略必须建立在对于推动制造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的全面理解之上，例如，投资现代基础设施，建立知识和技术能力，加强配套机构建设。南亚和东亚在这种政策干预上有所差异。

最后，生产力促进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农业作为一个低生产率部门被忽视了。为了维持其他部门的增长，并加速随增长而来的结构改革进程，必须处理这种政策偏向。

总之，劳动力向现代可贸易部门的转移，特别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转移，可能是增长和减贫的关键。但像这样令人满意的结构性变化，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也不能由当今世界的市场机制驱动。在这里，政府的作用变得很重要。因此，根据其本身的经济特征进行适当的国家干预对于结构转型和持续减贫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Aradhna Aggarwal是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与商务系的教授。《国际新兴市场》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的高级编辑。

*·专家视点·*

**南半球的新冠病毒：**

**为低收入家庭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遏制儿童贫困**

Rev. Fred Nyabera

除了对公共卫生的直接影响外，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还可能产生广泛的经济影响。许多国家已采取措施，通过实行宵禁、封锁和约束行动来限制或阻止社会交往。这些措施都对贫困家庭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这些贫困家庭只能依靠日常收入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大约3%，疫情将导致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超过90个国家已向基金组织寻求某种类型的金融援助，以帮助它们经受住此次疫情大流行的考验。大多数南半球国家都在寻求援助的国家之列，这些国家的医疗负担日益加重，农业、旅游业、采矿业和石油销售等传统收入来源也在萎缩。南半球的大多数政府有巨额的预算赤字，无法实施类似于北半球国家的刺激政策。更糟糕的是，恰恰是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时期，疫情袭击了南半球国家。

**抑制措施的潜在影响**

在南半球，大多数人就职于非正规部门，妇女占非正规工人的大多数。南半球国家的失业率也很高，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同时也是不稳定性较大的地方。为遏制病毒传播而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增加了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贫困人群的生活成本。许多人住在非正式的定居点，那里缺少水源和卫生设施、非常拥挤，这一切负面因素使得贫困人口的生活更加困难。许多人生活入不敷出，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也没有可观的储蓄。低收入家庭还缺乏可支配的现金，在封锁期间无法储存粮食，因为他们需要持续的日常收入来满足基本需要。

工作机会正在流失，生计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儿童贫困将急剧增加。许多低收入家庭为了维持生计，每天仍在继续做着原本的工作，但这常常使他们面临感染病毒的风险，同时也可能因为藐视政府的防疫法规而被逮捕。对这些脆弱的家庭来说，保持社会距离不容易做到，因为他们不得不继续在使他们更容易感染病毒的环境中工作，而疟疾和霍乱等疾病的流行更恶化了这种情况。

**对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的影响**

新冠病毒对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可能在短期内更为严重，这些家庭的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迫切需要保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使他们免受最大的损失。令人担忧的是，南半球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非正规的，对这些国家来说，无论是建立G20国家正在推出的那种社会保障体系还是采取经济刺激措施，都缺乏财政空间和财政资源。但是，南方国家仍然有机会利用现有资源，采取紧急措施来减轻影响。

**南半球采取应对的机会**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使南半球各国政府有机会从根本上解决儿童贫困，废除那些加剧家庭贫困和扩大经济不平等的现行政策。首先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卫生系统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并满足对经济适用房、水和卫生措施的需求。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包括瞄准特定群体的现金转移，如贫困人口、老年人和残疾人。预计南半球国家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体系。

**直接和间接的措施**

新冠病毒将直接和间接地进一步加剧儿童贫困，南半球各国政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减轻其影响并积极发展适应本国情况的社会保障体系。影响儿童和低收入家庭的直接措施包括:

•粮食和营养安全：生存、营养不良和发育缓慢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粮食援助、广泛的粮食和营养安全政策将有助于减轻这一风险。这可以通过扩大正在进行的针对脆弱儿童和低收入家庭的国别计划和紧急粮食援助来实现。

•初级卫生保健和急救人员监测：确保持续向儿童提供初级卫生保健非常重要。这不仅能早期发现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疾病，而且还能继续提供对儿童至关重要的常规服务，如免疫疫苗接种。

•直接受益转移(DBT)：加强社会保障体系还应包括针对贫困家庭和儿童的直接现金转移计划。各国政府应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向已经预先确定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提供现金援助。这直接使得低收入家庭能够应对大流行的负面作用。

认识到社会保障体系在减少低收入家庭儿童贫困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南半球各国政府必须同样注重采取间接措施，对低收入家庭产生正向影响，从而间接保护其子女。这些措施包括: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财政援助：实施一揽子财政援助计划，包括全面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暂停支付水电费、补贴、贷款减免、利息减免、特殊就业保障计划以及为低收入家庭、个体户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减税。

•以城市贫民窟和非正式定居点为目标：对此开展干预措施将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以防止未来疾病暴发的蔓延，并通过提供紧急卫生服务、卫生设施和供水来减少贫困。

•监测和包容最弱势群体：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应加强努力，识别那些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个人，包括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边缘社区家庭及其子女，以便对他们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包容。

作者简介：Rev. Fred Nyaber是国际NGO组织，阿里加图国际，结束儿童贫困计划(Arigatou International – End Child Poverty)的项目主管。

原文链接：<https://endingchildpoverty.org/en/blog/559-covid-19-in-the-global-south-urgent-need-for-safety-nets-for-low-income-families-to-stem-an-increase-in-child-poverty>

*·减贫前线·*

**应对疫情：为脆弱国家启动3000万美元的紧急应对基金**

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存在的贫困、不安全、治理薄弱和基础设施脆弱等问题，如果不能立即得到解决，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紧急应对基金（Rapid Response Facility，RRF）旨在加快和促进该类紧急援助。

该基金提供的支持包括为患者购买基本药物、为医护人员购买个人防护装备、检测设备以及推动旨在提高社区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认识的法案。

该基金成立一个月以来，已有83个国家受益，开发计划署承诺的物资总额达2330万美元。该基金提供的援助资金来自于核心资金的重新配置以及捐助者通过开发计划署的危机应对基金窗口提供的资金。

根据联合国的统一原则，所有资金需求要和联合国驻该国其他分支机构的有关计划和方案保持一致，最重要的是，要与有关政府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紧急应对机制有助于立刻抢救生命并启动社会经济的应急和回复计划。其作用范围包括关键的防护设备与医疗用品的采购、数字方案的应用如确保业务不中断的线上健康平台与电子政务平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Achim Steiner说。

“作为联合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一部分，开发计划署通过重新规划其投资组合和提供额外资金，预计将向100多个国家发放多达5亿美元的快速融资和支持，以准备、应对疫情的流行并从其破坏性影响中恢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抗击疫情的全面支持包括三个关键要素：帮助预防和阻止病毒传播源、帮助在疫情爆发时做出紧急反应、提供资金帮助缓解最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

RRF提供的这笔种子资金正在帮助维持政府运作的核心职能，20个国家（包括不丹、科特迪瓦和也门）正在使用这些资金去提供数字和信息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以便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在疫情危机期间维持远程工作。其他创新包括在摩尔多瓦使用卫星图像进行方案设计，在哥伦比亚对小型企业供应链进行系统性净化，以及在许多国家广泛支持非正式企业将生产转向个人防护装备（PPE）。

开发计划署的工作吸取了它向全球基金和50多个国家的伙伴提供大规模保健方案的经验。例如，从2014年到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30多个国家提供了10亿美元的卫生采购和供应链强化服务，仅在艾滋病药物采购方面就节省了6500万美元。

原文链接：<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news-centre/news/2020/COVID-19_30_million_Rapid_Response_Facility_launched_for_vulnerable_countries.html>

*·书籍推荐·*

**书评：《测算世界各地的贫困》**

Roberto Iacon

Anthony B. Atkinson是贫困和不平等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是极其富有号召力的业界权威。Atkinson的这本书是留给未来几代研究贫困问题学者的丰厚遗产，力量强大，影响深远。书中强调了贫困在政治辩论中的中心地位，这使得贫困测算成为一项至关重要又复杂微妙的任务。

作为一名英国经济学家，Atkinson爵士（1944-2017）是贫困和不平等领域的权威人物，他激励了广大学者群体，对世界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Atkinson于2017年去世，有赖于John Micklewright和Andrea Brandolini两位编辑人员细致而富有激情的工作，这本书最近得以出版面世。Atkinson在这本遗作中总结了他一生在贫困领域的贡献。在这篇书评中，我将尽量涉及本书的全部章节。其中，我对6-9章的介绍可能相对较少，这几章关注世界特定地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发达国家）的贫困，但是这部分内容相对其他章节来说并不完整。Atkinson还计划在书中搭建一座桥梁，将贫困和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和气候变化等相关问题相连接。这两个方面在法国著名学者Francois Bourguigno和Nicholas Stern的后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贫困的测算是一项微妙而重要的任务，《测算世界各地的贫困》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强调贫困在政治辩论中的中心地位是如何导致这一问题的。在整本书中， Atkinson细致地给出了可以得到有意义且包含充分信息的贫困测算结果所需要的步骤：首先要考虑贫困的多种定义，然后分析数据的关键作用，最后要贯通货币和非货币贫困测算。我选择了这样的一段话来总结 Atkinson对这个主题的看法:

贫穷测算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这本书不像一本修理管道的说明书，因为正确的答案往往取决于受政治影响的观点。在本质上，贫困测算属于道德判断的问题。而所有这些判断都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影响。（读者可以评判一下这种观点和Esther Duflo 2017年的演讲“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她在演讲中倡导“经济学家在研究和设计政策时应该采用管道工人的心态”。）

该书的另一个潜在信息是，政府绩效评估（通过谨慎地贫困测算）与政治行动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Atkinson指出，强调世界各地在消除贫困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是非常重要的，这能提醒各国政府：他们有责任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推动着政策行动。用 Atkinson自己的话说：“监控进展的能力是有效行动的先决条件”。

在第一章的一个小节中讨论“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贫困”时，Atkinson分析了“工具的”和“内在的”动机。虽然工具性的关心与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对个人幸福的直接影响有关，但内在动机更多地与伦理和道德判断有关，这些判断导致人们担心“遥远的穷人”。Atkinson似乎忽视了工具性关心的基础，声称贫困和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确定的。但是在我看来，无论人们采用何种方法来建立贫困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工具性原因应该作为关注贫困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内在动机和工具动机将为全世界消除贫困提供更广泛的理论基础。

关于内在的关心， Atkinson描述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方面，“孤立主义”的世界观只关注某一特定社会或国家内的个人福祉，对“遥远的穷人”则不予重视。相比之下，“全球世界主义”的观点给每个人予以同样的重视，意味着对全球每个角落的贫困水平和各种形式的受剥夺情况都给予同等的关注。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有限同情”的观点认识到消除全球贫困的重要性，然而，它更重视解决国内的贫困问题。虽然在我看来，Atkinson在书中的倾向更偏向于“全球世界主义”的观点，但是他没有忘记引用其他的观点，并且公正地给出其他观点背后的依据。

这本书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试图联系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贫困测算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国内贫困测算，并分析二者之间潜在差异背后的原因。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包括了60个国家贫困测算的国家级报告。 Atkinson在制定这些报告时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他将世界银行的贫困和不平等测算与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进行了比较，为关注特定国家贫困的学者和决策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项工作并非纯粹工具性的，因为 Atkinson认为，将这两类测算结果联系起来对于提高全球和各国级别的贫困估计的可靠性至关重要。此外，从全球测算回到各国对各自贫困水平的测算，使得贫困的概念在各国获得了特定的政治意义，并使这些测算结果在任何级别都变得更为可靠。

书中还以较长篇幅详尽的概述了非货币贫困测算背后的原理：例如,多维贫困和贫困指数（如牛津大学贫困和人权中心（OPHI）的多维贫困指数（MPI）和近期的全球同行版本）。有趣的是，Atkinson并没有把货币贫困和非货币贫困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衡量标准，而是在第五章中展示了这两种方法是如何相互加强的。换句话说，他证明了世界上大多数货币贫困水平较高的地区非货币贫困的发生率也更高，这证实了收入作为福利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在本书第九章的结尾， Atkinson回到了他研究的核心问题：把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贫困纳入到一个单一的“全球贫困测算指标”中（Atkinson 和Bourguignon, 2001）。他的观点是，评估贫困时要考虑各国不同的社会标准，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采用相同的国际贫困线（IPL），从而丰富了全球贫困的定义。他提出的方法也很简单：在低平均消费的国家选择IPL（现行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0美元）的货币贫困的阈值，同时让较富裕国家的货币贫困基准水平随人均消费线性上升（因此在富裕国家关注的是相对贫困而不是绝对贫困）。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得到相对来说更有意义的世界贫困人口数量的估计，从而避免令人不安的结果，即富裕国家没有贫困，毕竟一些富裕国家几乎没有人的消费低于IPL。基于这一方法， Atkinson估计2013年全球有12.2亿至20.2亿人生活在贫困家庭中（取决于对富裕国家相对贫困梯度的选择）。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贫困测算标准，建立在作者第一章中提出的“全球世界主义观点”的基础之上，因为解决贫困问题在国内和国外同样重要。与此相反，“有限同情”的观点意味着，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针对该国的世界贫困数字，因为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会认为解决遥远国家的贫困问题并无太大价值。

该书的一个小缺点是其结构的复杂性，一般主题（如“增长、不平等和减贫”）被放在专门讨论世界特定地区贫困的章节中，而不是放在专门的单独章节中。

总之，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学到的主要一课是，贫困是一个非静态的、多方面的概念，贫困的解释和测算都不断地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更多样化的方法。Atkinson爵士给未来几代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留下了深刻而清晰的遗产，我个人期待看到它在未来几十年的影响。

书籍信息：Measuring Poverty Around the World. Anthony B. Atkin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书评作者Roberto Iacon是挪威大学经济学和社会政策副教授。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

**主 编**:刘俊文

**副 主 编**:谭卫平 张广平 徐丽萍 夏庆杰

**本期编译**:刑羽丰

**责任编辑**:贺胜年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

**邮 编:**100028

**电 话:**010 84419659

**传 真**:010 84419658

**电子邮箱**:xuliping@iprcc.org.cn

**网 址**:www.iprcc.org.cn

1. 文献中也使用了改良的Lilien指数(MLI)来衡量结构变化(Lilien, 1982)。他是这样构造的：MLI=$\sqrt{x\_{it}x\_{is}(ln\frac{x\_{it}}{x\_{is}})^{2}}$, $x\_{it}>0,x\_{is>0}$。MLI和NAV指数的量级和符号很接近，所以本文仅报告了后者。 [↑](#footnote-ref-1)